

# 被吹灭的工业文明之灯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变革启示

吴 兰 香

**内容提要** 凭借超前的科技手段，来自 19 世纪美国“康州”的时空穿越者汉克·摩根轻而易举地登上了六世纪亚瑟王朝的“首相”宝座并着手进行各项改革，决意把中世纪的英国变成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虽然汉克一度营造了繁荣的工业文明景象，但是其忽视社会特殊性的简单复制行为、错位的改革理念以及建立在科技权威基础上的专制统治决定了乌托邦幻想的破灭，而他与英国教会的斗争也以大屠杀收场。在没有约束和监管的权力运作中，现代科技最终演变成了反民主政治事件的同谋，成了暴力事件制造者手中驯服的工具。

**关键词** 马克·吐温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工业文明 变革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是马克·吐温 1889 年的作品，讲述 19 世纪美国人汉克·摩根穿越时空在中世纪英国经历的政治浮沉故事。凭借超前 13 个世纪的学识和技能，汉克轻而易举地在亚瑟王朝确立了自己的威信，成为不折不扣的实权派人物。官拜“首相”后，汉克开始秘密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决心把落后的英国带入 19 世纪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在前四年中，因为根基未稳，汉克只得暗中经营。不过，他在各方面的改革成效明显，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还获得了民间流传的尊称——“我们的老板”。在和众骑士的比武大赛中轻松胜出后，汉克把秘密进行的改革全部公开。整个英国面貌大变：“奴隶制度一去不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捐税实行平均摊派。电报、电话、留声机、打字机、缝纫机，以及那上千种利用蒸汽和电力的仆人，又

听使唤又很容易驾驭，全都渐渐流行开了。我们在泰晤士河上有一两只轮船，我们有了一支烧蒸汽的舰队，商船队也已初具规模……我们正在修几条铁路，从卡米洛特到伦敦的那条已经完工，早就投入营运。”<sup>①</sup> 看起来，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中世纪的英国即将跨越 13 个世纪的历史鸿沟，跃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汉克本人也为自己造就了这个“即将开出繁茂的文明之花的国家”（《康》：287）而飘然，沾沾自喜地准备当这个国家的首任总统。

不过，这一切终究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教会重新掌权之后，宣布把汉克逐出教门并号召各路骑士追杀围剿。短短几天之内，“美丽的文明一口气给吹灭了”（《康》：313）。汉克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变成了全国讨伐的对象，最后中了大魔法师默林的魔法，被送回了美国“康州”老家。穿越者汉克在亚瑟王朝的经历颇具戏剧性，在这一起一落、一浮一沉之间，有很多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

## 一、简单化的“复制文明”工程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描述，进入亚瑟王朝之前，汉克是个经验丰富的美国工头，善于各种机械制造。因为和工人打架，他的脑部受损，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异样时空之中。这是公元六世纪的英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亚瑟王统治的时代。这个国家生产方式落后，教会势力庞大，社会等级森严。这里的老百姓循规蹈矩，忍气吞声，对领主和主教的欺负和压榨不敢吭声。那些名闻遐迩的“圆桌骑士”事实上是一些“内心极为单纯的家伙”（《康》：17），喜欢聚在圆桌旁用夸大的言辞讲述各自的冒险故事。在汉克看来，这些声名卓著的英雄简直就是“脑子似乎不够用”的“托儿所”小朋友，他们津津乐道的斩杀巨人的冒险故事则是小孩子们的互相吹牛编瞎话，“完全是童年的表现和标志”（《康》：17）。

生活在这个国家，汉克觉得自己就好像是现实版的鲁宾逊·克鲁索：“我看出来了，我成了又一个鲁宾逊·克鲁索，流落到了一个无人小岛上，接触到的只有一些多多少少已经驯化的动物，我要是想让日子过得下去，就得像鲁宾逊那样干起来，构思，发明，创造，重新组织，要让手脑都动起来，一样也别闲着。”

<sup>①</sup> 马克·吐温《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何文安、张煤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302 页。后文出自同一作品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作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康》: 41) 鲁宾逊的故事不只是一个西方人流落荒岛、谋求生存的经历, 还是一个“文明人”在异域他乡“播撒文明”的过程。大卫·希维尔说: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 鲁宾逊·克鲁索故事的喻义在于, 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 文明一定也必将会复制自身; 发现, 然后是占领, 冒险家和社会弃儿都受同样的目的论控制”。<sup>①</sup> 和鲁宾逊一样, 汉克决心把 19 世纪的文明复制到六世纪的英国。他要开办实业, “把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训练成专家, 各种手艺以及各种科学技术的专家”(《康》: 59); 他要废除骑士制度, 推翻教会统治, “替全国人民解除压迫”(《康》: 86)。在汉克眼中, 亚瑟王朝的政治制度就像一件穿破了的旧衣服, 他要领导变革, 扔掉这件破旧的政治外衣, 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外衣穿在中世纪的英国身上。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中汉克的社会重塑理想直接体现了美国人约翰·L. 奥沙利文提出的“天命”思想。1845 年, 奥沙利文在他主编的《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上撰文, 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兼并得克萨斯, 宣称其他的国家正在“挫伤我们的政策, 束缚我们的权力, 限制我们的伟大, 阻碍我们实现自己的天命——在上帝分配给我们的大陆上扩张, 顺应逐年增长的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sup>②</sup>。奥沙利文关于“天命”的说法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引起了反响。他们把美国看作远离罪恶的新人类居住地, 认为自己“有一个命中注定的、上帝批准的使命要完成”<sup>③</sup>, 所以, 他们要扫清障碍, 大步向前, “向人类展示神圣原则的卓越非凡”<sup>④</sup>。事实上, 早在 1839 年, 奥沙利文就写了一篇题为《未来的伟大国家》的文章, 为美国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而造势。对于这个“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的扩张行为, 奥沙利文在文章中以毫不遮掩的口气反问: “谁会限制我们前进的步伐? 谁能这么做?”<sup>⑤</sup>

“天命论”曾在 19 世纪 40 年代风行一时。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宗教信仰引申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sup>⑥</sup>, 到了 19 世纪后期, 随着美

① David R. Sewell, “Hank Morgan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Utopia”, in Eric J. Sundquist, e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a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94, p. 144.

② John L. O'Sullivan on “Manifest Destiny”, [http://1.scds.org/resources/US-History/1845\\_John%20L.%20O'Sullivan,%20On%20Manifest%20Destiny.pdf](http://1.scds.org/resources/US-History/1845_John%20L.%20O'Sullivan,%20On%20Manifest%20Destiny.pdf).

③ Robert W. Johannsen, “The Meaning of Manifest Destiny”, in Sam W. Haynes and Christopher Morris, eds., *Manifest Destiny and Empire: American Antebellum Expansionism*,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

④ John L. O'Sullivan, “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 <http://web.utk.edu/~mfizge1/docs/374/GNF1839.pdf>.

⑤ John L. O'Sullivan, “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

⑥ 霍世亮《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 载《美国研究》1992 年夏季号, 第 21 页。

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天命论”又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解释美国的优越性。这种论调摆脱了天意授权的限制，“给了‘天命论’一个新的借口，把重心从天命转移到科技解释上面来”<sup>①</sup>，为美国模式的出口做好铺垫，为政府的进一步扩张扫清舆论上的障碍。

奥沙利文“把美国看作一个注定要把领土扩张到整个半球的高人一等的国家”<sup>②</sup>，汉克同样要以美国为蓝本，把“卓越非凡”的美国模式推广到中世纪的英国。在他看来，不管是在科技发展模式，还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把美国的文明复制到英国都是他当仁不让的“天赋使命”。可是，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注定不会成功。汉克自比为鲁宾逊·克鲁索，肩负着“播撒文明”的历史使命，但是，鲁宾逊改造的是一个荒岛，而汉克要面对的是教会力量强大的亚瑟王国。这是一个“从制度上否定了任何教养、影响、教育力量”<sup>③</sup>的国家。这里的百姓“最古雅、最单纯、最轻信”（《康》：48），他们受控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那些能够创造奇迹、控制他们生活的人顶礼膜拜。也就是说，“那些内化了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民众失去了依据实际经验感知对环境进行理性测试并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sup>④</sup>。在汉克初来乍到之时，这刚好为他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能够依靠自己的现代科技知识制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逐步登上权力的顶峰。可是当汉克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时，曾对他顶礼膜拜的民众立刻丢下汉克，选择了教会。

汉克在亚瑟王国开办了各种作坊，训练熟练技术工人。他希望通过新型的培训，通过工业化社会的各种流程改造民众，完成从六世纪到19世纪的大跃进。但是，他的社会重塑工程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被设计或规划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sup>⑤</sup>。亚瑟王朝的“君主制、封建主义、原始技术、遍及各地的鬼神式思维”（Twain：

① Quentin Youngberg, "Morpholog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Justified Violence of John O'Sullivan, Hank Morgan, and George W. Bush", i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35 (2005), p. 324.

② Quentin Youngberg, "Morpholog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Justified Violence of John O'Sullivan, Hank Morgan, and George W. Bush", p. 317.

③ Walter Benn Michaels, "Armies and Factories: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Eric J. Sundquist, e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a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94, p. 129.

④ Abraham Kupersmith, *Twain and Freud on the Human Race: Parallels on Personali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9, p. 10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6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1) 给了汉克显示自己的现代知识威力、满足自己权力欲望的契机,也同样维护了教会的统治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六世纪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对控制自然的魔力征兆深信不疑。由于当时的君权神授思想观,在卡米洛特有很多人相信王室和神职人员拥有上帝授予的超自然能力。因此,普通民众把教会和贵族的权威作为上帝权力的延伸而加以接受”(Twain: 102 - 103)。汉克自信地认为,只要杀死所有的骑士,就能结束骑士制度,削弱教会势力并进而消灭贵族特权,推翻教会统治。这样一来,社会制度的恶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本来,汉克领导的是一场造福于民的斗争,应该能得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汉克和教会大军的对峙中,前来讨战的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代表,在骑士和乡绅后面还跟着广大的民众,人们全都“往军营里跑,要把他们毫不值钱的生命和值钱的羊毛献给那个‘义举’”(《康》: 328),迫不及待地向教会表示他们的忠诚。显然,在简单化的“复制文明”过程中,汉克忽略了亚瑟王朝的社会特殊性,这种“机械地应用一般的规律只能导致实践上的失败、社会理想的幻灭”(《国》: 436)。

## 二、错位的改革理念

不可否认,汉克在亚瑟王朝进行的是一项意在推动社会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大型社会工程。可是,作为新社会的设计者,他“忘记了社会工程最重要的因素:它的效率依赖于真正的人类主体的反应和合作”(《国》: 299)。为了阐述变革的必要性,汉克曾经引用美国宪法说明民众的重要性,称“一切政治权力来自人民,一切自由政府都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康》: 83)。但是,在一项项的政绩工程面前,汉克的心思被改革占满,腾不出位置来容纳人民及“人民的利益”。他真正关注的是他的改革计划,可以说,他“关心抽象意义上的普通人,却忽略了具体的人”<sup>①</sup>。在推广改革计划的过程中,他把人视作手段,看成改革机器上的零部件。

在外出行侠途中,汉克曾碰到一些农户和手艺人,一些对于国家来说“有点用处,或者说值得保存,真正值得尊重”(《康》: 79)的人。汉克试着和他们谈论人人平等和普选权,其中一个牧羊人对他说过的话似有感悟,被他看做是“男

<sup>①</sup> Bernard J. Dobski, Jr. & Benjamin A. Kleinerman, “‘We should see certain things yet, let us hope and believe’: Technology, Sex, and Politics in Mark Twain’s *Connecticut Yankee*”,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9 (2007), p. 613.

子汉”。对于这个可造之材，汉克决定加以利用。于是他借了牧羊人的鲜血为墨水，拿木片在树皮上写了一句话：“送他到造人厂。”（《康》：84）设立“造人厂”是为了改变民众的观点，让他们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尊严。然而，汉克启蒙民众的第一步竟然是沾染鲜血的暴力行为。他重视教化的作用，可他又把接受再教育的人看成“造人厂”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有尊严有独特个性的个体。

为了推广肥皂，改变民众的卫生习惯，汉克利用游侠制度，让骑士们在全国各地宣传，还让手下的骑士拿隐士做试验：“为了让贵族们相信肥皂有益无害，什么试验都得做，再吓人的试验都得做。最后，要是贵族还不相信的话，那班文明使者就非得去抓一个隐士来不可了，反正树林子里到处都是隐士。”（《康》：99）其中一个叫做拉科特的骑士在推销过程中“居然把隐士洗死了”（《康》：100）。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致人死命，这样的改革与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概念差之千里。更为荒唐的是，汉克竟然把圣泉谷的一个隐士当做机器来用。这个隐士以祈祷时不停地哈腰鞠躬而名声远扬。汉克用他弯腰产生的能量作为缝纫机的动力源，让他工作了五年，生产了一万八千多件一流的粗亚麻衬衫，卖给朝圣者。就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隐士变成了一架人体发电机。

汉克的改革本应该以造福民众为主旨，可是，不管是对待普通民众、贵族骑士还是隐士乡绅，他大都采用戏耍利用的态度。他的“造人厂”只不过是把人从一种奴役状态转变到另一种奴役状态，人们被控制的现实还是没有得到改变。按照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的观点，人作为理性主体，“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做目的”<sup>①</sup>。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代替的目的，一切其他东西都作为手段为它服务”<sup>②</sup>。在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把他人视作手段。汉克却“把别人仅仅当做自己的工具，而不同时把他当做自在目的”<sup>③</sup>。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来重塑社会，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架设改革机器，并且随心所欲地把民众变成这架机器上的部件。在汉克心目中改革是目

①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页。

②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80-81页。

③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82页。

的，亚瑟王国的民众则是帮助他达到改革目的的手段。

如果说发生在牧羊人身上的沾血写字、发生在隐士身上的肥皂致死只是牛刀小试，那么小说结尾处的大屠杀则是汉克的改革目的论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其实，汉克的暴力改革观早有端倪。在故事中，汉克曾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暴力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如果说暴力能够带来他心目中的社会进步，如果“一次鲜血汇成的大潮”能够将“千年的罪恶荡涤一净”，那么这样的革命就是一场“永远值得纪念、值得感谢的革命”（《康》：81）。

“恐怖时代”其实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激情澎湃之下杀人，导致了一万人丧生，另一次是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致一亿人丧生；前者只延续了几个月，后者却历经千年。可是，令我们心惊肉跳的却都是那个“次要的恐怖”造成的惨状，也就是那一次转瞬即逝的恐怖。可从汉克的角度看，一瞬间死在利斧之下，与一辈子挨饿受冻，受尽屈辱蹂躏，苦熬苦撑，慢慢折磨致死相比，还能算什么惨状？汉克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在他看来，如果他能领导一场革命，推翻教会统治和君主政权，消灭骑士制度，把中世纪的英国直接变成19世纪的共和国，在革命中牺牲多少生命都是值得的。按照他的计算，在千年的折磨中死掉一亿人和在几个月的斗争中牺牲一万人，从经济和效率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后者更可取。汉克对于革命的想法就是，“但凡革命，要成功必先流血，此后用什么手段是另外一回事”（《康》：132）。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由于美国佬的政治还是以技术变革为其主要特征，只要他以英格兰共和国作为唯一目标而不考虑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那么就没有什么内在限制来约束他为实现政治目标而采取的行动”<sup>①</sup>。

作为亚瑟王朝的实权人物，汉克希望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实现自己的乌托邦梦想。这种“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乌托邦幻想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并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为了达到目标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国》：117）。在与英国教会的冲突中，面对全国上下一边倒的选择，汉克觉得自己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决定以毁灭的方式结束他的变革。于是，随着“一声爆炸，我们制造文明的工厂一齐飞上了天，从地球上消失了”（《康》：331）。苦心经营的文明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汉克的改革宏图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不

<sup>①</sup> Bernard J. Dobski, Jr. & Benjamin A. Kleinerman, “‘We should see certain things yet, let us hope and believe’: Technology, Sex, and Politics in Mark Twain’s *Connecticut Yankee*”, p. 611.

能做“老板”，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一切，那么他就要毁灭一切，以免多年的建设成果落入他人手中。如此看来，“汉克的乌托邦目标从来就抗衡不了他那自我膨胀的汹涌激流，到了最后，所有的规划四分五裂，这一切就好像来自孩子式的挫败感”<sup>①</sup>。

### 三、科技“大人物”的专制统治

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科学和社会不公平：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题》中，美国学者桑德拉·哈丁对现代科技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哈丁一样，不少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对这一话题予以高度关注，有些还“指出了现代科技和他们文化中反民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之间的同谋关系”<sup>②</sup>。在缺乏监管的权力真空中，现代科技很容易沦为当权者手中的工具，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破坏性因素。用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来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sup>③</sup>。

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也是马克·吐温在《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这部作品中探讨的一个话题。吐温曾在自传中谈及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我想我原先打算把英国的生活，不只是亚瑟王时代，而且包括整个中世纪时代的英国生活和现代基督教国家及现代文明做一对照——当然，是要突出后者的优势。”<sup>④</sup>但是，他紧接着列举了比利时王朝在过去14年里的凶残行径，尤其是在刚果犯下的残暴罪行，并且不客气地指出：“生活在中世纪的穷人条件够苦的，但是跟过去14年来刚果国的境遇比起来，那样的条件简直就是天堂。”<sup>⑤</sup>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中，马克·吐温“开始渐渐感到痛苦，他痛心于人类无法把道义上的进步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尤其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竟是为了建立帝国和殖民地，以

① Derek Parker Royal, “Eruptions of Performance: Hank Morgan and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e Midwest Quarterly*, 45 (2003), p. 29.

② Sandra Harding, *Science and Social Inequality: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Issu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p. 2.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④ Mark Twain,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Charles Neider,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9, p. 355.

⑤ Mark Twain,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p. 356.



便把他人置于实实在在的被奴役状态”<sup>①</sup>。

在中世纪的英国，汉克是无可争议的科技权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群矮子当中的巨人，一群小孩中的大人，傻瓜群里的智多星：不管用哪一种合乎情理的标准来衡量，都要算整个不列颠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大人物”（《康》：51）。然而，在这个“大人物”的手中，领先他人的科技知识却渐渐演变成成为一种权力，成为一种控制他人的力量，成为汉克走向极权和专制的垫脚石。对于科技发展与道德、伦理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马克·吐温深感不安：“汉克把推动卡米洛特进入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自己的‘使命’，但他的尝试笼罩在阴影之中，吐温对笼统的由机器体现的社会进步持怀疑态度。”<sup>②</sup>

现代科技成就了汉克，把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工头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人物”。汉克先是利用日蚀事件树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刚到卡米洛特城时，汉克处境危险，他被凯易骑士抓住，作为俘虏关进土牢，第二天将被处死。当他从前来探监的克拉伦思那里知道当地人笃信魔法时，“满心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康》：33）。他确信自己的日蚀知识不仅能救命，而且能成为平步青云的台阶。当日蚀发生时，汉克极力展示自己的表演天赋。他扬起胳膊，指向太阳，把太阳被遮说成是自己做法的结果，最后不仅将自己从火刑柱上成功救出，而且因为“保全了太阳，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康》：48）而收获了国人的感恩戴德，在亚瑟王朝获得了重要席位，位居国王之下，百官之上。

日蚀事件让汉克名声大振，使他成了无所不能的大人物。潮水般的欢呼声让汉克陶醉，“像这样远近驰名，万众景仰，是很令人舒坦的”（《康》：42）。面对民众的顶礼膜拜，他不是逐步告知真相，开始他对民众的科技启蒙，而是一再利用现代科技知识进行各种奇迹表演，俘获民众的拥戴。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通过操控公众来为自己的成功播撒种子”<sup>③</sup>。公众对神奇魔法的崇拜刺激了他愈来愈强的表演欲。在和对手默林的较量中，他在默林的塔楼里埋炸药插上金属杆吸引雷电，在暴风雨来临之际，用引电杆引来雷电炸毁了默林的塔楼，同时故弄玄虚地糊弄老百姓，说是自己引来了天火炸毁了塔楼，结果“民众匍匐在地，个个失魂落魄，惊恐万状”（《康》：45）。通过这一轮的较量，汉克彻底击败默

① Harold H. Hellwig, *Mark Twain's Travel Literature: The Odyssey of a Mind*, Jefferson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8, p. 128.

② Lydia R. Cooper, "Human Voices: Language and Conscience in Twain's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i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39 (2009), p. 71.

③ Derek Parker Royal, "Eruptions of Performance: Hank Morgan and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p. 23.

林，成了亚瑟王国一手遮天的大魔法师。

在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汉克的权力意识不断膨胀。在这个没有竞争者的国家里，他轻而易举地成了控制一切的“老板”，坦然接受老百姓对他的崇拜，享受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带给他的快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绝对不是国王的影子，而是实际上的国王；国王本人才是那个影子。我的确大权在握；权力一类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徒有虚名，对于我却是名副其实的”（《康》：48）。当现代科技的威力和专断的权力相结合时，其潜在的致命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重权在握的实际独裁者，汉克的权力运作过程缺少了社会约束和制度监管这一环节。社会学家鲍曼认为：“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sup>①</sup>在缺乏有效的社会约束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维系在汉克的“道德本能”之上——他既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解放，也可以导致其毁灭。

然而，对自己的权威和判断有着超强自信的汉克却不这么看，他“甚至为专制权力辩护，只要是这种专制统治能够带来变化，带来他心目中的进步”<sup>②</sup>，认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国家带入更美好的未来：“在可靠人的手里，不受限制的权力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只有天上的专制政府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人间的专制政府，如果符合相同的条件，也可以算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就是说，只要那位专制君主是人类中最完美的人物，而且还能够长生不老……我的政绩表明，一个独裁者只要掌握了一国的资源，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康》：60-61）汉克自视为一个有作为的独裁者，一个完美的专制君主，认为他可以利用不受限制的权力高效率地推动社会改革，让工业文明之灯在亚瑟王国瞬间点燃，让这一前无古人的奇迹在历史上留下浓妆重彩的一笔。

作为“整个不列颠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大人物”（《康》：51），汉克坚信自己为民众作出的政治选择是最明智最合理的。他不看好一个统一的教会，因为这种教会会导致权力集中，威胁人们的精神自由并导致思想的瘫痪。但是，他却把自己的意愿加在民众的头上。他渴望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不过，他却“没能领悟民主概念最简单的一点：大多数人做主。”（Twain：114）当民众拒绝接受他的

①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② Jeffrey W. Miller, “‘It was a Pretty High Title’: Kantian Ethics in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41 (2009), p. 271.

领导，不选择他设定好的道路时，他坚持认为民众被洗脑了，称他们是“依头顺脑的绵羊”，是“人渣”（《康》：328）。眼见得自己亲手设计的“共和”蓝图灰飞湮灭，汉克的挫败感是不言而喻的。他亲手设计了一场大屠杀，“把追随者变成了杀人机器而不是推进民主进程的机器，他用威力无比的现代科技武装他们以达到他的目的”（Twain：114）。

在这个穿越故事的结尾，19世纪带给六世纪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武器的威力上。在与教会军队的较量中，汉克指挥了一场现代武器装备下的大屠杀，用铁丝网通电、引洪水入战壕、机关枪扫射等方式不费吹灰之力灭掉了25,000个骑士。现代的电力知识、水利知识和军事知识成了杀人的帮凶，“19世纪的文明并不是消除了六世纪的暴力，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暴力表达方式”<sup>①</sup>。汉克的变革没有给中世纪的英国民众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幸福生活，也没能消除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他“复制文明”的理想从科技变革开始，在科技屠杀中结束。他最终的失败寓意深远：一方面“戏剧化地展现了源于科技的自信自傲带来的暴力后果，表明了这种过度放纵的自我肯定可能导致的极端走向”<sup>②</sup>；另一方面，也使《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这部作品“成了一个警示故事，[批判了]任何一种意图用它自认为的高级版本、高级社会秩序替换一个已存的或者尚未实现的历史的乌托邦冲动”<sup>③</sup>。

[作者简介] 吴兰香，女，1970年生，博士，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近期成果有著作《性别·种族·空间：伊迪斯·华顿游记作品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论文《“教养决定一切”——〈傻瓜威尔逊〉中的种族观研究》（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焦虑——伊迪斯·华顿游记中的人称指代》（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等。

责任编辑：冯季庆

① Sam Halliday,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in Peter Messent and Louis J. Budd, eds., *A Companion to Mark Twain*,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 425.

② Quentin Youngberg, "Morphology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Justified Violence of John O'Sullivan, Hank Morgan, and George W. Bush", p. 324.

③ David R. Sewell, "Hank Morgan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Utopia", p. 150.